

群众文艺活动与創作的经验



江苏省文联办公室
《江苏文艺》編輯部 編印

一九六五年十月

目 录

新故事活动的经验与特色

- 蓬勃开展的上海农村新故事活动 左 查(1)
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 魏同贤(16)
向革命故事学习 姚文元(28)

新故事的作品与体会

- 两个稻穗头 徐道生 陈文彩(44)
革命故事《两个稻穗头》的创作体会 徐道生 陈文彩(53)
英雄阮文追 陈佐辉(61)
读者对新故事《英雄阮文追》的一些意见 (73)
一只鸡 蒋桂福(81)
为革命力争种出写作两好 蒋桂福(89)
好师傅 刘富华执笔(96)
故事《好师傅》的创作经过 刘富华执笔(104)
小数点 许春耘(108)

怎样讲新故事

- 带着阶级感情讲故事 郭士哲(114)
突出政治思想讲好革命故事 李树财(117)
讲革命故事要跟上当前形势 蒋桂福(121)
书根·书筋·书理 刘振华(123)

青年业余作者介绍

-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文学新人 ……昆明部队政治部文化部(126)
用毛泽东思想培育新苗 ……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135)
紧紧和集体靠在一起 ……黑龙江省文联(141)
努力做一个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人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145)

业余作者谈创作体会

- 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形象 ……李德复(154)
学习写作的点滴感受 ……王慧芹(161)
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业余创作 ……陈桂珍(167)
为革命而写作 ……习久兰(172)

蓬勃开展的上海农村新故事活动

《文艺报》记者 左 查

《文艺报》编者按：新故事活动，是一种新型的、革命的、群众性的业余文学活动。它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生动地进行阶级教育的锐利武器，对三大革命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也就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口头文学，它是最为群众喜闻乐见，又便于为群众所掌握、便于发挥群众创造性的文学新品种之一。它是有强大生命力，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在开展新故事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培养、也已经培养出大批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社会主义文学接班人；能够产生、也已经产生了许多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的优秀作品。新故事活动很早就在上海农村兴起，在其它地区的农村，在许多工厂和连队也得到了蓬勃地开展。我们发表本刊记者的这篇报道，综合地介绍了上海在开展新故事活动方面已经取得的突出的成就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各地在继续推广新故事活动的时候研究和参考。我们也很希望各地在开展新故事活动中，随时总结经验，提供大家研究和参考。

上海农村的新故事活动，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当时市里经常举办赛诗会和赛画会，郊区各县则有赛故事会的活动。上海群众艺术馆曾经在各县举办的基础上，组织过一次全郊区的赛故事会。但由于缺乏经常的有计划的领导，全市范围的活动并没有坚持下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阶级斗争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了。面对着党所提出的要占领思想阵地的号召，上海的文化艺术部门把新故事作为农村小型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内容。接着，在一九六二年末和一九六三年初，市文化局和共青团市委联合举办了一期故事员训练班。故事员回去就发挥作用。这样，新故事活动便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起来。

中共上海市委对新故事活动给予完全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保证了这个活动的迅速而健康的发展。到今春为止，郊区各县的故事员已经由一九六三年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一万多人，他们活跃在农村人民公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一支强大的文艺轻骑兵。

新故事活动正在逐步占领旧文化在农村的基地和市场。它形象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配合三大革命运动，生动地介绍新人新事，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新故事内容丰富多采而活动形式简单，它不需要布景、道具、舞台，甚至也可以不要灯光；它不计时间，不论场合。在田头、场角、茶馆、车站，在民校的课堂和社员的家里，到处都是故事员活动的地方。他们利用劳动间隙或会前会后，见缝插针地进行活动。甚至在一些农活的劳动过程中，也可以开讲。新故事的革命内容和轻便形式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是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群众文艺的优美样式。新故事活动正以其崭新的姿态蓬勃发展，欣欣向

荣，前途未可限量。

一 新故事活动在斗争中发展

前几年每当三秋完毕和春节期间，一些旧艺人也趁机活动，大量散布反动的封建文化。以南汇县书院人民公社为例，这个公社傍邻东海，地处偏僻，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全公社十四个大队，没有一处规模较大的集镇。革命的文艺活动在本地很少开展，外来演出也不多，因此文艺领域长期为封建迷信所盘踞。尽管没有茶馆和书场，那些流散的旧艺人却常常游荡到村口桥边，摆一个说书摆子，讲什么《粉妆楼》《天宝图》《济公传》之类。既宣扬了反动文化，散布了低级趣味，又骗取了群众的钱。

书院公社党委认识到这是一个争夺思想阵地的问题，所以，在一九六三年春天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让武装部长陆国植按照《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材料，向大会开讲雷锋故事。讲到“雷锋童年”那一段，到会的很多干部都感动得哭了。外灶大队的民兵队长还当场上台发言，回忆自己悲惨的童年，向旧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控诉，深深激起了干部们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这样，雷锋故事便作为旧小说旧故事的对立物，在书院公社流传开来。

但是，落后反动的旧故事并没有从此消声匿迹。那些旧艺人还在群众中寻找市场。针对这种情况，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公社武装部长陆国植又选择了一所小学的课堂，在课余开讲革命故事《劫狱》。一些群众本来是到小学旁边来听旧书的，一看武装部长讲得神采飞扬，不知不觉都被吸引住了。散场以后，一位旧故事迷老木匠对陆国植说：“我过去只当新故事没啥听头，现在听听邪霸（很好）。明朝我再来！”而那个眼睁睁

失去了听众的旧艺人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他的《粉妆楼》再也没有在这一带出现。

新故事活动跟旧故事争夺阵地的事迹不可胜数。又如上海县三林人民公社故事员吴训仁，一天偶然路过一家茶馆，只见许多群众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说旧书。那艺人手舞足蹈，津津有味地讲《施公案》。吴训仁觉得这是在向群众灌输封建反动思想，十分反感。于是他征得当地文化站的同意，在第二天专程前往这家茶馆，以强烈的阶级感情开讲《血泪斑斑的罪证》，使茶客们深受感动，一时间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从此，这一带茶馆的旧书旧故事就被新故事所取代了。

旧书旧故事曾经迷惑过相当多的农民群众，特别是老农。只是在新故事不断斗争下，局面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书院公社洋溢大队的老年社员朱杏根，就是既爱听、又爱讲旧故事的人。在一次拣棉花的劳动中，他讲开了《乾隆皇帝游江南》。一位青年故事员听了觉着不对味，为了争夺阵地，便打消顾虑讲了《血泪斑斑的罪证》。群众听了说好，又让他讲了《半夜鸡叫》。老人被青年打断了话，最初气鼓鼓地在一边很不高兴，但听着听着却来了劲，心悦诚服地点头称是了。这个大队的大队长瞿祥根过去爱听旧书，还常常给社员讲《天宝图》。新故事活动的开展给了他很大教育，他便响应公社党委的号召，积极收集新故事脚本和材料。在一次社员大会上，他带头上台开讲《老队长迎亲》，轰动全场。瞿祥根从此就成了一名出色的故事员，深受群众的欢迎。群众自豪地说，这是他们的“瞿队长迎亲”！

就这样，新故事活动以革命的姿态到处同旧故事争夺阵地，大讲工农兵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

二 鮮明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故事活动方向正确，旗帜鮮明。它紧紧地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上海农村普遍开讲《血泪斑斑的罪证》。这个集中揭发地主阶级罪恶的故事使老年人纷纷忆苦思甜，批判那种“吃了饱饭忘记讨饭”的思想，并且大讲家史，把在旧社会身受的阶级压迫告诉下一代，要他们“晓得长辈的出身根底，永不忘本”。中久大队的民兵们听了和讨论了《血泪斑斑的罪证》，激发起阶级仇恨，提高了革命警惕，从而加强了夜间巡逻，时刻注意敌对阶级分子的一举一动，果然发觉地主分子黄金平在深夜还翻看账本子。经过侦查，搜出来竟是一本变天账，叫做“土地房产登记手册”。这本变天账的第一页居然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父兄之仇深似海，今生不报非好汉”。横批是“决不忘记”。党支部当众进行了揭发，群众见了，情绪激愤，纷纷说：“过去以为地主安分守己了，也跟我們一样劳动了。想不到他是鱼死眼不闭，时时在妄想变天。我们一定要同他斗争到底！”

为了配合参军运动，各县大讲《雷锋参军》《兄弟参军》等故事。书院公社有一适龄青年，两次征兵都因自己不坚决，不能说服老人而未入伍。一九六三年他听了《雷锋参军》，立志要做雷锋式的战士。他岳母百般拖腿，逼他成亲。在剧烈的斗争中，他想到故事里雷锋的形象，想到自己要做雷锋式的战士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他终于找了党支部，说服了岳母和未婚妻，使她们欢欢喜喜地送他到兵役站。现在，这位青年已经几次立功，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五好战士。《兄弟参军》也同样对农村青年参军卫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祝桥公社在动员

大会上讲了这个故事，故事中适龄青年张国汀和张永汀立刻双双上台，爭先报名；不料台下也有金火祥和金锦祥兄弟俩，搶着参军，结果是兄弟俩都检查合格，成了同故事婉美的参军佳话。

同样地，新故事活动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斗争。上海县莘庄公社社员们听了《穷棒子办社》的故事，议论说：“穷棒子社开始是三条驴腿，我们开始有半条牛，为什么他们办好了，我们就办不好呢？”坚定了走集体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南汇书院公社中久大队的青年们在试验田里元麦套种棉花，麦收以后经风一吹，棉苗死去大半。青年人泄气了。团支部便召开会议，讲个《低产田里夺高产》的故事。大家听了说：“这故事好像为我们编的！”于是，便精神抖擞地大干起来。故事中的人物是三次补苗，而这些受故事启发的青年则不屈不挠地补了四次，终于战胜了自然，打了个漂亮的胜仗。

“学大寨，赶大寨”。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迎接今年农业生产新高潮，上海农村的新故事活动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高潮。郊区各县各人民公社都已经传授或开讲了《大寨人的故事》。青浦县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年听了激动地说：“我们差得太远啦！人家遭了灾，国家三次补助都不要。我们没遭灾，只是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还差点肥料，就老想伸手向国家要！”听完故事就发动群众积肥打野草。一天下雨活儿不好干，有个社员主张“今朝勿要去了吧”，许多社员说：“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山造田，我们淋点雨算什么？”结果当天超额完成任务百分之二十五。大寨人气壮山河的革命精神已经通过故事的媒介，在上海人心里开始生根、抽芽。

新故事在宣传晚婚、计划生育和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等各方面，都起了极为显著的移风易俗作用，并且直接打击着农村

中存在的封建迷信活动。青浦吕燕华趁“算命先生”给群众“算命”时大讲《小铁口改行》，讲得那先生面红耳赤而去，以后再来却挑上担子干修理活儿了。群众说：“这可真是‘小铁口改行’啦！”

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为各项中心工作服务，这就是新故事鲜明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保证新故事不是旧故事那样的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三 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上海农民普遍欢迎新故事。

一九六三年春节，上海县三林公社故事员吴训仁从市里学习回来，年初一上午在三林茶园讲《红岩》，轰动了远近。下午在另一家茶馆讲《血泪斑斑的罪证》，听众越来越多。初二讲《创业史》，听众不散，要求明天再来。但初三吴训仁有事没来，听众向茶馆提了一大堆意见。初四吴训仁来讲《杨立贝》，讲完已经八点多钟，而听的人仍然不散，只得又讲《雷锋》。两个故事讲了三个多小时，夜深了，群众却都说：“一点也不晚，邪气嘛！”

为什么这许多旧故事迷一下子变了新故事迷呢？

南汇书院公社的老年社员汤常青，过去也是个旧故事迷。但现在他说：“过去的东西听了只是笑笑，无形当中上了它的当。还要丢掉钞票，好处的确是没有的。现在讲新故事实在好。从前我们吃旧社会的苦，今朝常常要忘记，多听新故事就可以多想想从前，比比今朝。”他的老伴也说：“新故事讲过去的事，我吃过苦，要听；讲现在的事，我心境里开心，也要听。”这对老夫妇的看法反映了新故事首先从内容上，以它强烈的

革命看实性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因此在新旧故事之間，群众有了完全正确的选择。他們说：“听了几十年《济公传》，就沒见一个活佛下凡。”“现在听革命故事的人越来越兴旺。讲前朝古代的人只好自拉自唱，我們不要再听了。”

新故事所以为群众喜闻乐见，还由于它具有适合于群众的簡易灵活的形式。妇女們孩子多，家务多，劳动完了也沒有太多的空閑，因此即便是公社放电影演戏，也不想拖儿带女，撇下家务去看。而故事呢，在田头听，在场上听，有时还送上家門来，这样慢慢地也就上了癮。

当然，除了简单和方便之外，新故事还有它为群众欢迎的艺术特色。听书院公社鹽祥根讲《老队长迎亲》，从故事員脸上仿佛看到了那位积肥老队长的音容笑貌；搖櫓、撑篙、捞水草，都如见其人，如聞其声。故事員用自己的感情让听众感受了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也就是老队长那颗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的赤誠无私的心。徐梅芳讲《保健員打針》，好像她说的就是自己的事情，为了苦练打針的硬功夫，年青的保健員怎样把尖利的針头一下又一下地往自己的腿肚子上扎。陆国楨开讲《斬网》，一下子就把听众带到白茫茫一片的大海上，身历其境地目睹这个捕捞大队的漁民在惊涛駭浪中发扬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放弃已经到手的几千斤魚，斬断魚网，拼着性命去抢救将要被海水吞沒的阶级兄弟。陆国楨在十四、五度的气温下开讲，讲了一半就揮汗如雨，而听的人也紧紧地跟着他感情的起伏，直到听完，才敢透一口气。

讲新故事不像说旧书那样有許多做作和不切实际的夸张，但也不能照着脚本宣读。故事脚本当然是讲述的依据，但口头文学的样式却规定故事員必須有自己的再創造，而关键則在于感情的表达。正因为故事員用质朴的群众語言和真实

丰富的感情，生动、形象地讲述群众所关心的事情，或者就是群众中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四 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上海农村的新故事活动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关键在于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

一九六三年十月，群众艺术馆举办第一次农村创作故事会串，集中各县的优秀作品进行表演。《新民晚报》发了一则小消息。柯庆施同志看到以后，立刻打电话给文化局负责同志，要他汇报详细情况。柯庆施同志对新故事活动给予了完全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认为抓得对，抓得好，要求认真地坚持抓下去。市委还为此批转了文化局的一个报告。在柯庆施同志和市委指示以后，文化局和共青团市委都进一步把工作开展起来，报纸和电台也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一九六四年，单《文汇报》就对新故事活动发了七篇社论，选刊了不少的故事脚本和有关的消息报道，为这个新生事物造了很大的声势，推动了它的发展。

各县县委和各公社党委也重视新故事活动，有的已把这项活动正式列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

南汇书院公社党委会对开展新故事活动就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长期以来，我们讲阶级、讲生产、讲改造自然，可是旧书旧故事却讲命运、讲福气、讲帝王将相和神妖鬼怪。我们做报告讲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而旧艺人却讲“济公活佛”和《粉妆楼》。有的群众受了迷惑，有的还代为传播。这就使党委感觉到：一颗子弹只能打倒一个人，一部坏书或一个坏故事，却可以毒害许多人。怎么办？开始时党委决定取缔非法的流散艺人，但群众有意见。群众说：“非法的赶脱了，合法的来呀！”

光赶不来，我們听些啥？”事实上，你撵走他，他却仍然来，矛盾没法解决。这里就有个群众需要的問題。更严重的是旧故事长期流传，面广量大，而不少群众甚至干部还替它传播。这些义务“故事員”是无法取締的。这样，党委就考虑到用什么东西去占领陣地的問題。

公社党委的重視，使那次三級干部会议上出现了陆国楨开讲的第一个故事，即雷鋒故事。随后，又派了一个共青团員去市里参加学习，带回来《血泪斑斑的罪证》。这两个故事发生了很大影响，又进一步引起了党委的重視。在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党委组织公社干部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体会毛主席的指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給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主席的指示使大家思想开了窍，使大家认识到一切阶級都是用文艺来为本阶級服务的，讲故事本身就是阶級斗争，只有用革命的新故事去挤掉反动的旧故事，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

公社党委在支部书记会议上正式号召大讲革命故事，要求干部能讲的自己讲，不能讲的发动和组织群众讲，干部要带头听和议论故事；并且提出“讲故事也是干革命”的口号，把故事活动列为政治工作中的一部分，責成公社团委当作一项主要工作来抓。同时规定，公社干部下到大队和生产队，除抓生产外，第一要抓好毛主席著作学习，第二要抓好新故事活动。

党的领导是搞好新故事活动的关键。在上海，从市委开始的各級党委都重視这项活动。为了推动今年农业生产新高潮，市委曾经利用一次会议的机会，让各县县委第一书记听取了《大寨人的故事》，随后又指示在全市传授和推广这个故事。青浦县委经常在三級干部会议上组织讲故事，最近得悉县文

化館在傳授《大寨人的故事》，立刻召集全縣公社的黨、團支書來聽，號召他們首先體會和學習大寨精神，同時設法開講這個故事。在青浦縣朱家角鎮，鎮黨委親自指揮着故事員打開局面。當年青的女教師徐亞珍面對着任務有些胆怯，不敢進入茶館的時候，黨委書記用烈士的革命事跡教育她，給她講李大釗同志怎樣在白色恐怖下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怎樣不顧生命危險而上街進茶館。徐亞珍終于打消顧慮，勇敢地跨進了茶館，占領了陣地。正是在各級黨組織的重視、關懷和領導下，新故事活動遍地開花，在上海農村迅速而健康地發展。

五 無產階級的口頭文學隊伍的形成

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上海農村已經形成了一萬多人的故事員隊伍。

各級黨組織十分注意故事員隊伍的政治質量，就是首先解決“什麼人講”的問題。書院公社黨委把有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看成是故事員的首要條件，要求挑選那些成分好、思想純正、生產積極、學習努力而又能夠以集體利益、群眾利益為重的青年，來擔任故事員，並且進行了隊伍的整頓。整頓以後的隊伍更純潔了，也更壯大了。在現有的一百六十三位故事員中，黨員十三人，團員九十三人；絕大部分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是革命的農村青年。市里舉辦訓練班，也注意對故事員的政治教育。落實到基層，則更加注意故事員的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因為故事員是通過自己的講演在群眾中活動的，有很大的獨立性，所以黨委常常教育他們“讓群眾信服你的為人，因而也信服你講的道理”，要求故事員努力使自己成為“紅色宣傳員”。

故事員在黨的教育培養下覺悟不斷提高。“紅色宣傳員”

的称号使他們感到自豪，也感到肩負的責任。为了提高讲演水平，他們常常在劳动之余相互观摩，相互议论，废寝忘食地孜孜以求，把脚本念而又念，以至揣在兜里揉成了碎紙片。书院公社的徐芹伯经常忙里偷闲看脚本。烧飯、上廁所，甚至夜里蒙着被子还用手电照着看。他的信奉基督教的母亲阻挠他讲故事而要他念《圣经》。他耐心地向母亲摆家史，他母亲终于觉悟过来，同意和支持他讲故事了。

学习故事中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怎么讲就怎么做，严格要求自己，这已经是年青的故事員队伍中正在形成的好风气。青浦故事員呂燕华，讲了雷鋒故事就以实际行动向雷鋒学习；她把雨具借給一位带孩子的妇女，自己在滂沱大雨中跌跌滑滑地护送了好几里，临别还不把姓名留下。有一次，呂燕华讲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故事《一把镰刀》，发现听众有人在笑她。她苦苦思索方才想到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母亲与一个劳改回来的反革命“干亲”界线不清。呂燕华想，我自己家里人界线不清，讲阶级斗争还有誰要听？她于是回去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罵她管的太宽。她回答说，“我們紅色故事員，就应当管的宽！”直到把母亲说服才罢。

这些生动的事例说明，上海农村的故事員队伍，是一支成长中的年青的无产阶级口头文学队伍。在党的培养下，他們方向对头，任务明确，像对待革命事业那样对待故事活动。大批的故事員在活动中经受了锻炼而入了团，大批的故事員由于言行一致、生产积极而成了五好社員。在参軍和支援边疆建設等运动中，許多人带头应征，許多人奔赴边疆。

六 新型的社会主义文艺創作

当故事活动开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出现故事脚本

和需要之間的矛盾。書院公社在這方面的體會是：“打仗要用槍，槍里不能只有一顆子彈。故事員讲故事，也不能光講那一個。要經常滿足群眾需要和及時配合中心任務，就必須不斷更新故事腳本。”

農村故事員所講的故事，來源有三方面。一是現成材料，包括專業人員創作的或根據影劇、小說改編的腳本；二是自己改編；三是自己創作。

上海群眾藝術館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已經舉辦了六期創作訓練班，接受“帶着故事素材來”的學員。除進行政治教育而外，還邀請作協分會、出版社和評彈團的同志來輔導，參加學員作品的議論，提出修改意見。基本方法是：開小組會，由作者們口述自己的作品或素材；大家議論；本人修改；試講；加工定稿——“五部曲”。通過訓練班培養了不少優秀故事員，輔導出一批較好的故事，如《一只雞》《親家墳》《老隊長迎來》《兩個稻穗頭》等。

蔣桂福是貧農出身的故事員，擔任着商楊公社港滸大隊黨支部副書記的職務。在訓練班幫助下他写出了《一只雞》（發表在“故事會小叢書”上）。這故事歌頌一個一心為集体的好社員，又批判了自私自利的壞思想，写得風趣而動人。許多群眾听了這故事的廣播極為感奮。思想比較落后的社員就問：“你是不是写我家的雞吃隊里的谷？占小便宜確實不對，該批評！”蔣桂福還幫助許多人對故事進行了加工整理。群眾反映他一不為名，二不為利，就是勤勤懇懇為社會主義編故事。

徐道生是青浦漣盛公社的副社長。他創作的《育種專家》經過多次反復加工，而后改為《兩個稻穗頭》，在各縣農村發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徐道生在舊社會里是個動不了筆杆的農民，但“現在有黨的領導，有各方面幫助工農兵開竅，為什麼不

写”？他认为：“不把群众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写出来，讲开去，就是抹煞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正因为这样，他特别注意在创作过程中听取群众意见。他的故事都是先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经过群众的反复检验而逐步写定的。

服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就地取材，从现实斗争中经过群众检验而产生作品，这是新故事创作的基本特点。在这方面，南汇书院公社也有着深切的体会。

当时，年青的故事员们闹剧本荒。党委就根据毛主席思想指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要求大家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动手编写。“什么叫革命故事？就是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我们种试验田经过许多曲折，不就是故事？老贫农的家史，不就是故事？地主黄金平鱼死网破妄想变天，不就是故事？小青年参军，不也是故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公社创作组成立了。根据地主暗藏变天账的事实，加上另一个地主婆每年“祭奠”她被镇压了的丈夫血衣的罪行，创作了《决不可忘记》；根据严桂芳坚决与地主儿子解除婚约的事实，创作了《抗婚》；根据一位青年跟岳母和未婚妻斗争胜利的事实，创作了《阿青参军》，等等。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在各级党委的关怀下，上海农村的新故事创作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已经发表的作品中，属于农民业余作者的还不是很，但大量的没有发表的则根本无法统计。就书院公社来说，除了已经发表的三篇（《斩网》《接班人》《保健员打针》）之外，流传开来的创作故事就有二十多篇。这说明社会主义的新故事创作具有多么大的潜在力量。

在短短的时间里，本刊记者访问了上海的有关部门，粗略